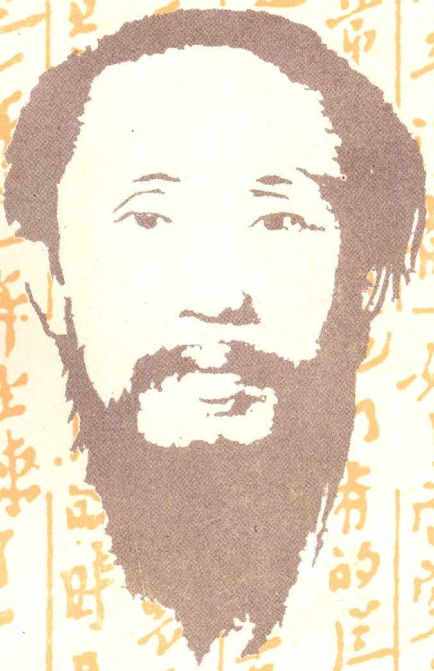


巴人文集

· 戏剧卷 ·



宁波出版社

梦 的 追 求

——忆任叔

周而复

“在这样贫苦境中的我要读一点书，求得一点普通知识还不可得，居然要求得一个余暇时间来吟哦诗篇，我自己也觉得太僭越了。然而在十八岁那年起，我竟要在我梦底一角上组起花圈来了。”

这是王任叔同志一九二五年三月间所写《自叙》中的一段文字。象许多中国作家从诗歌开始走上文学的道路一样，任叔也是。一些年青的读者，大概不知道，早在一九二二年，任叔就在《文学旬刊》、《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许多诗歌，可是没有戴上诗人的桂冠。他以小说家和散文家闻名于世。

我认识任叔是在三十年代初期，那时他已经出版了十部左右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集，有的已经绝版，有的很难买到，当时我没有机会读到，看任叔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是《皮包和烟斗》。我们当时都忙，见面的机会虽多，畅谈的时间却少，但他待人热情诚挚，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特别是对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给我留下了平易而又深刻的印象。每次见面，我们无话不谈，肝胆相见。

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他是中共江苏省委文委成员，参与领导上海抗日文化工作和统战工作。因工作需要，他留在孤岛上海，参加编辑出版《鲁迅全集》的工作以外，还从事进步的新闻出版工作，担任《译报》副刊编辑等职务。我离开上海，到革命圣地延安去了。临行前夕，我们在霞飞路一家餐馆里会面，他约我给

《译报》写一些散文和特写一类文章，介绍大后方和战地高涨的救亡图存的抗战热烈情绪，以鼓舞孤岛的人民。我们一行数人，先到了香港，经广州、长沙、武汉、西安，去了延安。记得写了一些从广州到西安的见闻，有一篇是在登了西安华山以后，住在北峰寺庙的客房里写的，随写随寄。后来，上海朋友来信告诉我，从《译报》上的文章，得知我的行踪。我在旅途上，任叔没法给我来信；到了延安以后，陕甘宁边区处于被封锁状态，无法和外边通讯，即使表面上通邮，但是经过国民党的“邮检”，信件是很难收到的，甚至无辜地牵连到收信人。我和任叔便鱼雁鲜通了。

再次见到任叔，是在香港。一九四六年夏天，组织上分配我到香港担任文化方面工作，大概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吧，或者十二月，记不清楚了，任叔忽然到了我在英皇道的住处。当时我和冯乃超同志住在一起，事先知道任叔到了香港，但具体情况不大了解。这次见面，真是惊喜交集。惊的是他好象从天而降，不期而遇；喜的是久别重逢，快慰渴念之情。原来任叔一九四一年九月就从上海到了新加坡，在南侨师范当教员，领导文化工作，同时协助胡愈之同志做些统一战线工作。不久，他转到印度尼西亚去了，这对他后半生的生活、工作和著作有重大的影响。他参加苏门答腊反法西斯同盟，是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印尼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担任地下报纸的编辑工作。这当然不容于日本法西斯军阀。日本军阀妄图熄灭千岛之国的反抗的烽火，开展了大检举。他在苏门答腊先达附近印尼农民家里隐蔽下来，耕田为生。八月十五日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地向盟军投降。侵略者从前门走了，殖民者从后门来了。荷兰又想继承殖民者的衣钵，企图仍然统治印尼，理所当然地遭到印尼人民的反对，受到正义者和进步人类的支持。任叔这时担任印尼华侨总会联合会的顾问，参加华侨爱国民主运动。这以后，他又参加印尼

人民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殖民主义者贪婪的残暴的眼光注意到他的头上，终于对他下了毒手，逮捕了。度过三个多月的牢狱生活，华侨总会、中国文艺家协会和著名人士胡愈之等广播抗议，在强大的压力下，荷兰军队被迫释放任叔，他才安全地到达香港。

我听他扼要叙述别后的经历，对他战斗在异国的英雄篇章表示深深地敬意，也对他曲折多磨的生活予以安慰。我希望他在香港多停留些日子，好生休息，迎接新的战斗。在香港工作不到一年，解放战争的捷报频传，一九四八年九月，他到解放区去了。

第二年五月，我带了一百多人，从香港搭乘一艘外国货轮到了天津，当天去了北平，组织上分配我去解放的上海工作。原先我希望到宣传或新闻部门工作，却分配我到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工作。这对我以后的工作和创作有重大影响。一九五〇年春，我出席中共中央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会上，意外地碰见任叔，我们紧紧握着手，相视而笑，似有千言万语要讲，许久，却讲不出一句话来。那些彼此胸中无声的言语，不用说出，双方都可以知道各自的心声：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要好好大干一番。这时，他担任中央统战部第二处副处长。

我们在文学事业上，是同一条战线；没想到在党的统一战线的岗位上，我们又并肩前进了。这段路，我们共同走了没多久，便分道扬镳了。他到雅加达，出使印度尼西亚。他担任驻印尼大使不到两年，便回国了。外交工作也许不是他的所长，他的文人气质很浓，热衷文学创作和文学事业。一九五四年终于回到文学岗位，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和副总编辑，可以大展他平生抱负了。他斗志昂扬，创作力旺盛，在编辑之余，写了大量文章，杂文更多。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的余波，株连到他的头上。他所写的《关于集体主义》、《“多”和“拖”》、《关于“氏族社会”》和《真的人的世界》、《论人情》等杂文，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当中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的帽子，不幸的遭遇接踵而

至。社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撤掉了，也不能执笔，即使写出文章也不可能发表了，降到编译所里当主任，后来又由亚非研究所编译室当主任。从此，销声匿迹，他很少和外界联系，我也不知他的去向，无从看望他了。但我没法忘记他，经常想念他，我不相信任叔这样一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为革命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的人，竟然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没有看他写的那些杂文，也不知道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具体情况，没法下断语，但我有保留，暗自说：且看将来的事实吧。

经常使我想起的是他对文学执着追求的精神，特别对《五祖庙》这个剧本。《五祖庙》初稿写于一九四六年，他当时以反法西斯同盟成员名义，支持反帝反法西斯和反封建的民族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爱国华侨大都是同情印尼革命的。华侨的职工、青年和妇女等团体同印尼相应的团体都有联系。华侨青年团体里成立了新中国剧艺社，希望以戏剧为武器支援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可是没有剧本，任叔毅然执笔了，写的是五位华侨英雄的故事。这故事早就在华侨中流传开了：他们五个人都是荷兰日里烟草农场里的苦力，同农场主订下契约，被叫做“契约工人”。农场主除给一份伙食费外，别无报酬；每天工作时间很长，受到残酷剥削和工头任意打骂，工人之间不准说话，没有行动自由。在那乌云密布下，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五位英雄再也不能忍受了，便秘密聚议，为成百上千的死去了华侨苦力报仇，相约杀了一只鸡祭神，大家喝了血酒，对天盟誓。第二天，他们乘机杀死了荷兰工头。不但农场好似一座监狱，整个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区域实际上也是一座大的监狱。他们身无分文，无法逃走，即使有钱，也逃不出殖民主义者的魔掌。那结果，在动手之前，他们就料到了。他们把荷兰工头分尸，各拿一段，飞奔到苏丹警察所投案去了。每个英雄都昂首挺胸，承认是自己一个人动手杀的。先后出现了五位主犯。警察所震惊了，荷兰当局也震惊了。他们妄想分化五位英

雄，个别提审，只要说出谁杀的，其余都可以释放。每一个人都承认是自己杀的，绝不牵连别人。他们的阴谋失败了。但殖民主义者从来不吝惜屠刀，迫使苏丹法院判处五位英雄绞刑。这种具有原始斗争方法的复仇行动，是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那时马达人、马来人和迦耶人反土地掠夺的斗争和华侨反对资本剥削的斗争是遥相呼应的，迦耶人进攻和围困荷兰人农场，有时马来人与之联合进攻，纷纷起义，声势浩大。起义的人被捉到以后，不是判处死刑，就是长期放逐。起义的大头领是迦耶人沙仑。尽管他们斗争的方法和策略比较原始，但反映了各族人民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任叔所写的《五祖庙》由新中国剧艺社改编上演获得巨大的成功和强烈的反响，受到印尼军队和游击队员的热烈欢迎，不是偶然的。但任叔不满足于这些成就。这以后，他又写了第二稿，易名为《五个被吊死的苦力》。一九五〇年八月，他出使印尼，外交上的繁忙工作占去他所有时间，无暇及此了。卸任以后，特别是重返文学岗位，被压在心底的创作热情又在燃烧了。

一九五五年夏天，访问印度和缅甸以后，我又奉命和郑振铎同志一道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尼西亚。离开北京以前，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看望任叔。他兴高采烈地谈完了出版社的计划后，雄心勃勃地谈到他个人的创作，又提到《五祖庙》这个剧本。他大概没有到棉兰这个希望之岛上看过五祖庙，希望我这次访问印尼，找机会去五祖庙看看，还托我搜集一些有关五位英雄的事迹。

我带着他的委托，特地访了棉兰的五祖庙。庙址距离民礼路旁不太远的地方（属白蒂沙区），庙并不大，也不高，但香火旺盛，五座泥塑木雕的英雄形象，栩栩如生，许多华侨到这儿来焚香祷告，络绎不绝。庙里的墙上挂着红底黄字的横匾，也有用绸子绣字的横幅，正中挂着一块灵牌，上面写着五位英雄的名字：

陈炳益

吴士升

李三弟

杨桂林

吴蜈蚣

灵牌两边挂了一幅对联，写的是：

立胆为义照千古

存心从忠著万年

我抄了姓名和对联，又向年老的华侨了解五位英雄的动人的事迹。这五位英雄年龄加到一起只有八十五岁，平均每人只有十七岁。他们豪迈气概却远远超过他们的年龄，连殖民主义者也不得不另眼相看。另一位满脸胡须的高龄华侨对我说，不止五个，判绞刑的是七个中国苦力，还有五个中国苦力判了终身劳役。这位老华侨说的可能是事实，因为荷兰殖民主义者屠杀中国苦力和印尼人民，至少也是上千论万的，五位英雄不过是那些屠刀下牺牲者的代表。特别令人敬佩的，是五位英雄在日里点燃了各民族联合反帝反殖的第一把火炬。

回到北京，我把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任叔。他如获至宝，特别是五位英雄在监狱中和法庭上的表现，令他肃然起敬，立即记下来了，笑容满面地对我说：“太好了，这对我创作《五祖庙》有极大的帮助。原来剧中人物的姓名是虚拟的，现在有历史真实资料，可以放手去写，准备以真人真事为主，加上根据历史发展的想象，再把剧本从头到尾改一遍，这是各族人民反帝反殖的第一把火炬，让它烧得旺些，更旺些！”这次，我们谈了很久，从他热情洋溢的兴奋状态中可以看出，他多么盼望把这个剧本写得更好。

任叔从事话剧创作不是由《五祖庙》开始，早在三十年代就对话剧发生了兴趣。一九四〇年出版了《前夜》（四幕话剧，后改名为《费娜小姐》），一九四一年出版了《两代的爱》（五幕话剧，

后改名为《杨达这个人》)。他的文学创作是多方面的，小说、诗歌和戏剧以外，还写散文、散文诗、杂文，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研究。他还翻译介绍苏联、德国、法国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他研究的范围也不限于文学，因为他先后在印尼多年，又懂得印尼文，把研究领域扩大到印尼历史方面。他曾送我一本《印尼社会发展概况》，这对我了解印尼有极大的帮助。他对我透露：准备写一部印度尼西亚历史巨著，预计一百万字以上。他的雄心，对我的创作是一种鼓舞的力量。他比我大十三岁，已经五十四岁了，还有这样的壮志，怎不令人敬佩呢？我等着看他的巨著。

一九五九年，这个不寻常的年头，一阵“反右倾”的风浪把他刮倒了。这以后，我们好象就没有机会再见到，只是偶尔从朋友当中知道他一些简单的情况。他生活得怎么样？是否继续在写作？都不甚了了。十年动乱期间，我失去了自由有七年之久，几乎与世隔绝了。朋友们的消息杳然，只是“押”到医院看病时，从马路的大字报上约略知道谁被打倒了，或者谁的名字上已经用红笔打了×，说明这个人出了“问题”。我住的“牛棚”和食堂之间有一段马路，必需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门，我特别留心贴在墙上的大字报，看有没有任叔的？没有。对那些进进出出的人，我也注意观察，其中有没有任叔？没有。我安心了，以为任叔在一九五九年受到批判，当时对这样的人叫做“死老虎”，一般不算重点打倒对象，也许幸而能够免去又一场灾难。但真实情况究竟怎么样？他是不是还活在人间？也有人以为我死在上海了。我在“牛棚”里是没法知道的。这十年，有点象苏东坡词所写的那样：“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等到我恢复自由，成了三看干部：看病、看书、看朋友，开始和朋友有些往来，暗中到处打听任叔的下落。经过一些年月，才有人偷偷地告诉我：任叔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了。死在家乡，很惨。具体情况怎么样？言者不详，听者更是不甚了了。这越

发叫我怀念，想多知道一些真实而又具体的细节。

任叔原名王朝伦，一九〇一年十月十九日出生于浙江奉化，在浙江省第四师范学校毕业，担任过中小学的教学工作，在广东北伐军总司令部当过机要科书记和秘书，在上海参加自由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长期担任地下党的工作，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工作。他的朋友，我多少也认识一些。我分别向那些朋友打听任叔最后在家乡情况，大家都伸出手来摇摇头，表示一无所知，有的还是从我这儿听到一些情况。我想到奉化，但我不认识他家乡的人，没法进一步得到任叔最后的情况，真是“十年生死两茫茫”啊！

有一天，收到一封信，寄信人是王克平，自我介绍是王任叔的儿子。我反复看了这封信，眼睛渐渐模糊了，字迹看不清楚了，忍不住落下了泪，濡湿了信纸的一角。读了那信，我好象见到那充满战斗热情的任叔。任叔，你怎么回到家乡去了？这封信上没有谈任叔晚年的情景，只是要我为任叔的《五祖庙》剧本写篇序。写序，当然义不容辞。我希望知道任叔更多的情况。不久，克平给我寄来一些资料，其中有《王祖庙的故事》，任叔一九二五年写的《自叙》和“王任叔同志追悼会悼词”等。

任叔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后，在亚非研究所编译室工作，潜心从事著作。空前未有的风暴把他卷了出来，“死老虎”当作“活老虎”打，因为他曾被捕三次，被诬蔑为“叛徒”，实行“隔离审查”，妻子与爱女被迫与他分离了，使他精神上遭受极大的打击。他身处逆境，还念念不忘他的工作，在给克平的信中写道：“但我还是打起精神，坚持搞派定的工作。现在在改写《原始社会时期》，搞那一套我从未在学校里学过的‘考古学’方面的东西。这东西实在也花过我几年中二三年的时间。”“我的健康是到家了，夹在三种矛盾之中，健康情况与工作的矛盾，健康、工作与未定案的相互矛盾。而我现在，则只有抓住工作。为了工作，健康也管

不得了。因为只有工作，才能表明我对党和人民的态度，因工作而倒下去，我也心甘情愿，只是完成不了，仍然还不了对人民的欠债而已。”他虽有凌云的壮志，但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了。在连续三次中风、大小便失禁之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任叔写了如下的遗嘱：

“十一月十六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二月十二日，三次突然晕倒，大便失禁。第三次情况相当严重，自六时至十一时，尚未十分清醒。以后如何，很难逆料，为此，写了几句话于后。

……在处理书籍时，如果我奉化中学的图书馆缺书，可尽量选择拿去。说是参加革命吧，我是从那里教书开始的。

遗憾的是不能完成我希望搞的《印尼历史》，也是对人民欠下的一笔债。

如是允许的话：死后火化，分骨灰为二瓶，一送我出生地大堰，在我们宅后竹山上埋下，一投之于海——我依然关心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胜利！……”

这以后，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他有时独自出去，不知怎么的撞倒在电线杆下，失去了知觉，经路人抬到派出所去，发觉他是“专政对象”，就无人过问了。深夜醒来，他茫茫然在黑夜中走去，神志已经不清了，幸亏遇到解放军，伸出援助之手，把他搭救了。但是康生和林彪江青一伙，紧紧抓住他不放，康生亲笔“批示”，勒令遣返浙江奉化大堰村山区。王克平因他父亲病情严重，生命垂危，不同意遣返山区。这有什么用呢？“造反派”一句话就是一个命令，何况还有什么“批示”哩！任叔回到家乡，病情发展了，脑血管严重病变，神志不清，甚至不穿衣服在村中奔跑，半夜也不睡觉，在零下几度寒冷日子里，他却躺在雪地里。这样严重的病情，山区的卫生院和溪口人民医院限于设备和医务人员的条件，都表示无能为力，是可以理解的。呼救无效，克平设法把他父亲送到杭州精神病院，本来以为可以有救了，但医院某

些人发现病人是“打倒”的“对象”，竟然拒绝治疗，不断通知家属，要病人出院，否则要强行送病人回家。克平不得不把病人带回家乡。在无人治疗的情况下，任叔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任叔脑溢血，耳朵、鼻子和嘴流血不止，心脏停止了跳动，在寂寞的山村里，悄悄地离开我们了。

任叔在十八岁那年吟哦诗篇，从“在我梦底一角上组起花圈”算起，走过了五十四个年头的漫长道路，给我们留下了一千万字左右的著作，在健康极端恶化神志还清醒的时候，仍然惦念工作和《印尼历史》（据说基本写完了），以表明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诚如他在《自叙》里说的那样：“……就是这样梦便告了终止，倒也落得个干净。然而疏了四五月的破琴，终难制止心中的要求，在那黄叶低吟的时节重复取下，弹起了梦曲，继续我底梦。”他对诗歌如此热爱，对小说、散文和文艺理论文章也是这般倾倒，甚至晚年对印尼历史也是那样专心研究，以为没有写完《印尼历史》也是对人民欠下的一笔债，就是死了，也要把一瓶骨灰投之于海，让它流到千岛之国，关心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胜利！这是何等诚挚的深情啊！

历史无情。颠倒了的是非终于又颠倒过来。康生和林彪、江青之流已经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一九七九年六月为王任叔同志平反昭雪大会在八宝山举行了，悼词里说：“现在党组织已批准改正了王任叔同志的错案和冤案，推倒了对他的一切诬蔑和不实之词，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这是可以告慰于王任叔同志的。”

“继续我底梦！”这是多么执着多么坚强的声音！第一个火把已经点燃，它就不会熄灭。梦的追求已变成和将变成灿烂的现实！

1984.12.28 北京

巴人文集·戏剧卷

目 录

梦的追求——忆任叔(代序)·····	周而复(1)
费娜小姐(四幕话剧)·····	(1)
两代的爱(五幕话剧)·····	(97)
五祖庙(四幕话剧)·····	(237)
附录	
五个被吊死的苦力·····	(381)
编选说明·····	(459)

费娜小姐

(四幕话剧)

改名题记

一篇东西写成，最苦我思索的，是要给它起一个名字。孩子并不是带着一个名字生下地来的；若干民族，对孩子命名日是一个大礼节。而我并不郑重命名的礼节，但给予它一个适当的商标，似乎是一切制造家心眼儿里下工夫的事。

这剧本写成后经过蒋天佐和楼适夷诸兄看过原稿，我给它一个名字：《费娜小姐》。适夷兄说，这题目不好，我同意了，换上一个《前夜》，因为这故事出现的期间，是在抗战的前夜；前夜之后是明天，带着这样祝福的心情，送它出世去。八年之后的今天，才知道，彼时的前夜，正酝酿着今日的一股黑暗势力，理合把这名字吊销了。

再说，我对文艺界太过荒疏。别人的商标，贴在自己货品上，也不免鱼目混珠。《前夜》这个商标，前有屠格涅夫的译品，后有华汉先生的创作。而我竟又来袭用，未免太那个了。虽然洋货与土货有别，商标雷同，还不至有何冒牌嫌疑，而同一土货公司的出产，商标自有优先权利，那又是我吊销这个名字的另一理由。

还是还它本来面目：让《费娜小姐》去暴尸天下吧！

不幸的是八年以前，需要她暴尸天下，八年以后，依然需要她暴尸天下。生而为中国人，是悲凉的！

第一幕

时间 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一个晚上。

地点 首都。事情发生在一个把所有的特务队都打发到糊涂国里去的阔公馆里。

布景 一个舞厅的侧面和一个客厅的正面。

舞台的左后方，开着个舞厅的圆形的拱门，珠帘半卷。舞台右方，占舞台三分之二的场面，是客厅。陈设极华丽，西洋风的。靠后的正中，有“山扒台”。上面放着各色西洋名酒，和酒器。

幕启时，客厅中灯光幽黯，舞厅中灯光由绿而红。继而乐声大作，男女杂沓，出没于舞池之中。其间有庄茂源和费娜，朱国柱和陈丽君两对，时时舞过拱门口。人们很容易看出胖子庄茂源，是不善于跳舞的。

一个极长时间的发狂的跳舞。

在客厅的幽暗的灯光下，开始有人影移动。渐渐走向山扒台去，开着酒瓶，把酒注入酒杯里，仰饮。轻轻地称赞着：“好酒！好酒！”这样继续喝了两杯，正要倒第三杯时，突然乐声终止，舞厅的灯光转成绿色，客厅的灯光放明了。那饮酒者手里的杯子就碰的落在地面，碎了。他惊惶地转过背来，是个约莫有七十岁的老头子，半把白的胡子。玄色羽绸的长夹衫。是这公馆里来了不久的门房庄兴。

庄兴 嘘……嘘……（装着赶猫的姿势）他妈的！是哪儿来的猫儿，到这里来打架，扎碎了你爷的瓶儿罐儿的！嘘……嘘……（俯身拾起打碎的杯子。往屋子四周瞧。）啊！这真可惜了！这么一只上好的杯子，也让这狗入的扎碎……但怕不会是碎完

了吧！（拼凑着）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叫补碗匠给补全来了？

〔沉默〕

呃！怎么这样不结实，一碎也就完蛋。这是什么杯子呀，洋杯！洋杯！唉！去你的吧！我说过，洋法子总是不行，——洋法子真的不行啊！

〔回身向山扒台，摆正酒瓶。但又回顾一下四周；偷尝一瓶葡萄酒。〕

呃吓！呃吓！……这是什么味儿呢！啊，这世界也全多改变啦！全多改变啦！一伙儿都是乌龟王八蛋！……老爷们不像老爷们，娘儿们不像娘儿们……是个什么样子？这么的，那么的……尽搂着跳呀！跳呀！这算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不懂！我简直不懂！……这都是小鸭子的娘作成我受的活罪：“难得庄老爷瞧得起你，来信叫你哪！上得京去做个跟班末，回乡来少不得也是个京官儿啦！”（学女人腔）……真个是狗入的种！嗯！……

〔沉默——泛起了乡思。〕

啊！……说起小鸭子的娘，她住在乡间多好。咱们庄家，有的是好大的庄园。黑牙牙的林子，绿洋洋的大坡田地，满院子的葡萄，这虽然是老爷家的，但也不就是等于我自己的？守着它，还愁一辈子没穿的吃的，……偏叫我来这里做个门房，成天离不开这死屋子！嗯！……

〔沉默——怀旧的情感起来了。〕

唉！说起咱们老爷，真的也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了！光绪皇帝时候，我还提过考篮，陪他上这儿来进过考。那时，他可多规矩，多严正。看见一位女子，自己就会脸红的；但现在，他是怎么了？……唉，但这还是洋法子不好。听说他去年放过一次洋，我看，一定是放洋放坏的。洋法子可好学吗？洋鬼子一来，咱们也受难了。……